李大钊与基督教文化

朱文通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李大钊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非偶然。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曾经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并对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过深入地研究。然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和认识,却有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发展过程。早期李大钊曾经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是其留学生活及留学时期的思想发展却一度深受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对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是李大钊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途径,对他后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社会主义;基督教文化;青年会

中图分类号:K 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28-08

李大钊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之前,作为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他认为宇宙本体是唯一的真理,真理是自然的因果,宗教则是神秘的迷信,因此与其信孔子、释迦、耶稣,不如信真理。1917年初,他先后发表《孔子与宪法》《真理》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把孔子之道作为国民教育修身大本写入宪法,指出不仅孔子之道,其他宗教和学派也不能写入宪法。并且,他认为制定宪法,应该坚持真理,促进文化发展,所以不仅要排斥信教自由,而且应该主张不信教的自由。由此可见,李大钊并未照搬西方政治学、法学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个人的独立见解。与此同时,他极为赞同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并发表《美与高》等文章,广为宣传。此后,他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1](P1024)},曾于1922年3月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使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明确表示反对背反科学原理的宗教迷信,特别是反对基督教,当然同时也反对佛教、儒教、道教等。他认为,既然有信教的自由,就应该有不信教的自由。然而,尽管如此,李大钊曾经明显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大钊

和基督教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比较特殊,他既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然而却又明显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活动。虽然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无神论思想和宗教观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基督教文化在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今仍然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李大钊与故乡的宗教环境

由于家人都没有明确、正式的宗教信仰,所以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李大钊并未受到来自宗教方面的任何影响。在大祖父李如珍的督促和影响下,李大钊自幼就受到了传统蒙学的熏陶,六岁入私塾,开始跟随单子鳌(此后还有赵辉斗、黄宝琳)读书,系统地接受儒学教育,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李大钊年少之时,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主要有老母庙(一说是观音菩萨庙,或谓是无生老母庙)、鼈神庙(道教)、华严寺(佛教)等宗教活动场所。除寺庙里例行的活动外,距离李大钊家不远处的老母庙,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有庙会;农历六月十三,村东头还有鼈神庙会。李

收稿日期:2013-10-19

作者简介:朱文通(1964-),男,河北沧州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近代社会史研究。

大钊年幼时,李如珍一般不让他四处玩耍;慢慢长大后,李大钊到寺庙或庙会上转转,李如珍可能并不反对。寺庙或者庙会上吸引李大钊的,主要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庙会上的皮影戏演出和庙里贴的对联、布告以及碑刻等。

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除了正式信教的人之外,一般人大多都很实用,比较功利,在仪式、仪轨等方面并不严格讲究。老百姓在有心理需要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家长或家里的成年人在家里或者到有关的寺庙里去烧香许愿,孩子最多是跟着看看热闹,并不直接参与有关活动。为了表示对偶像的崇拜,家长可能不许儿童做这干那。孩子也可能有点害怕,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偶像和牌位的敬畏感,对繁琐的宗教仪轨,更不会产生什么兴趣。

也有一些人见到寺庙就祭拜,见到神像或者牌位就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虽然虔诚,但是未必专一。在心到神知、心诚则灵等观念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多一些保佑和庇护不是坏事,总是好事。在华人圈里,甚至是儒家文化圈里,底层社会至今仍然是这种宗教文化传统,所以会出现一个村子或一个地方多个寺庙、数教并存的局面。李大钊的故乡也是这样,李大钊家人的宗教心理应该也是同上所述。因此,在这种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李大钊到寺庙去,主要也是玩耍,看热闹。

值得一提的是,华严寺里有一块光绪十三年(1887年)树立的石碑——《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石碑文》,此碑由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督办,由李大钊父子两人的私塾老师赵辉斗撰文、由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书丹。李大钊的祖父、父亲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村中的影响,并非出于信仰。可以设想,少年李大钊见到此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未曾见过的父亲,其次想到的可能就是练习书法和刻苦读书、考取功名等,难以发自内心地去关注宗教方面的问题。这是后来李大钊成为无神论者的乡土历史背景和文化起点。

1905年李大钊参加府试,试未竟,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兴新学,因在县试中成绩优异,他被卢龙永平府中学堂录取,从此“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2](P719)],发愤读书。就在这一年,在卢龙城中的最高处——平山顶端的永平府大堂东面居高临下的山岗上,建起了一座有四五层楼高的天主教堂。可以设想每天都能够看见这个教堂的李大钊的心情,除了感到屈辱、愤懑外,就是更加愤恨帝国主义通过宗教这种形式一再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因为这

个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于1900年6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被焚毁,而今则是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起来的。也可以说,这是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斗争对李大钊的一种间接影响。

在民国初年毁庙兴学热潮的影响下,特别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发动下,1919年冬,大黑坨村的华严寺被改为大黑坨小学,并开始招收女生。李大钊对家乡的教育寄予很大希望,为该校撰写了一幅对联:“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实际上是为学校指明了办学方向。1920年春,李大钊还为学校聘请了一位翟姓女教师,并赠送她20元路费,代为安排有关事宜。尽管华严寺里有一通石碑寄托着李大钊的大祖父、父亲和老师的某种思想和情感,然而这些对李大钊等人把寺庙改为学校并未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个人的信仰方面,李大钊早年在故乡始终没有受到来自制度化宗教或民间宗教的直接影响,对外来宗教则深恶痛绝。

二、李大钊在成长中曾经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综观李大钊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位清末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在思想上又具有较为浓厚的改良色彩。虽然也曾经一度参加过立宪请愿活动,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之一,但并非一个激进主义者^①。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和革命道路与同时代人明显不同,独具特色,就在于他善于独立思考,能够与时俱进,对民族、国家、人民群众的挚爱更为深沉,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直至忘我。他旧学根底深厚,又曾经深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最后又超越了二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代替康梁改良主义而成为历史主潮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代替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而成为历史主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李大钊既不同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也不同于孙中山,他是一场新的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发难带头举旗的人。”^[3]因此,“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李大钊是继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之后奋起探索救中国真理的第三代人”^[3]的杰出代表。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深受欧洲近代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忽视了这一点。

在1922年3月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之前,李大钊没有专门谈过宗教问题,只是在行文时因为讨论某些问题的需要偶尔提及,其中也涉及到基督教这个话题,然而只是为了说明有关问题。如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社会阶级和阶层制度的反映,“若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4](P237)}而宗教革新运动以来,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结合”,“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4](P243~244)}可见,李大钊对于基督教在社会变革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希望进行宗教改革,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旧宗教,但是不反对与之相适应的新兴宗教,即社会主义和宗教应该是相容的。

此外,李大钊还曾经灵活运用宗教经典说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有关信仰问题,他说:“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学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稣福音经典的效力。”^{[4](P248)}当然,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研究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发展,他希望人们坚定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在效力或形式上类似教徒对“耶稣福音经典”的信仰,很显然这个比喻只是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李大钊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文字谈及基督教问题,不再一一例举。

因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1922年4月4—9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从其一贯的立场出发,和有关人士一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1922—1927年),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1922年3月12日,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4月4日,李大钊亲自起草并和吴虞、李石曾等联名发表《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召开第一次大会。随后,李大钊又发表《宗教妨害进步》(1922年4月9日)、《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1922年6月)等文章,进一步提出不信仰宗教的主张和理由,在当时产生了深刻而又十分广泛的影响^②。其中特别指出:“不信仰一切宗教,亦是我们的思想自由。”^{[2](P71)}“我们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单单是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

宗教。”^{[2](P74)}

这是1949年之前除义和团运动外的惟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一样,都是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绝非单纯的反基督教运动。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认识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宗教问题的水平,对后来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李大钊始终都是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明确表示反对信仰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但是在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却曾经有过短暂的复杂多元的发展倾向,深受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特别是一度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加入基督教的人,屡屡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了社会主义者”^[5]的也不在少数。

第一,在日本通过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者进一步接触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在李大钊等引进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曾经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1905—1907年前后,一次是1912—1913年前后。在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影响下,即将从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的李大钊于1912年冬来到北京,结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总干事陈翼龙,并加入社会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该党由江亢虎创立,标榜“社会主义”,并获得孙中山的大力支持。李大钊受命和同学郭须静一起于1913年2月2日组建天津支部,李大钊为总务干事。1913年9月6日,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李大钊颇受刺激,一度萌发出世的念头。不久,应同学的邀请,在汤化龙、孙洪伊的资助下,于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李大钊特别关注当时日本社会民主党推动的,代表广大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声势浩大的大正民主运动,进一步接触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本主义等思想学说,由于此前他已经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对安部矶雄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颇为关注,并深受其影响。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人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矶雄恰好在该校任教授,给李大钊等学生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

策”等课程，“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6]李大钊曾经深受安部矶雄的影响，并通过他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⑤，此外还有物心两面改造学说等^[7]。李大钊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6]

此前，1912年李大钊在国内就已经提到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留学日本期间他更为关注幸德秋水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进而，继续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并广泛阅读有关论著。根据可靠资料，这一时期他更多的是阅读和研究安部矶雄的有关论著。如1920年6月，李大钊将自己收藏的267种日文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其中1914年至1916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购买的。《六合》杂志大正3年（1914年）11月号上，有安部矶雄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如在介绍法国工人党领导者儒尔·盖德时认为他“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等。《六合》杂志1915年第1号是“俄罗斯文化号”，其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也许是李大钊在研究中有特别需要^⑥，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期《六合》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这些都表明，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更为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综上所述，除了通过中国社会党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之外，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是李大钊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早期李大钊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个路径。回国后，李大钊开始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参考上述资料等，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等，由此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并为他全面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来，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才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李大钊一度还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第二，研究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1923—1924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

与社会运动》时，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曾经专门介绍过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李大钊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中最著名者三人：（1）金斯黎（Charles Kingsley），（2）摩利士（J. F. D. Maurice），（3）卢得郎（Loudlon）。”“此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均表同情于工人。”^{[2]（P544）}李大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三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主张^{[3]（P544~545）}。

其次，李大钊用近万字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罗斯金。李大钊指出：“John Ruskin（1819—1900）与 Maurice（1805—1872）为同时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人皆注意之”^{[2]（P545）}，“Ruskin 于一八四五年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办理劳工专门学校，主张将基督教义应用出来，即是社会主义。又主张合作，反对激烈运动，如罢工（过度者）。主张工人于物质生活外，更应有娱乐与趣味之生活。”^{[2]（P558）}应该指出的是，李大钊所言“John Ruskin（1819—1900）与 Maurice（1805—1872）为同时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有误，其中应该是混淆了两个“莫里斯”，即 Maurice 实际应该是 Morris。正像李大钊所指出的，罗斯金主要是一个“艺术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在介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时候，用大量篇幅介绍罗斯金，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此外，在谈到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时，大概是因为圣西门著有《新基督教》（李大钊翻译为《新耶稣教》），并且其弟子有的提倡基督教社会主义，所以李大钊亦称圣西门为耶稣教社会主义者^{[2]（P514）}。但是，在系统地介绍圣西门生平、业绩和思想时，李大钊只是强调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再提耶稣教社会主义者的话题。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李大钊是因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需要才研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李大钊是通过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而研究并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而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无疑是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基督教社会主义是19世纪欧洲诸多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当中重要的一支，也是近代欧洲改良主义思想之一种，同时也是基督教融入社会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基督教社会主义于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圣西门主义者毕舍和“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学说”^{[8]（P583）}的神甫拉梅耐。在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莫里斯（李大钊译为“摩利士”）、勒德罗（李译为“卢得郎”）、金斯莱（李译为“金斯黎”）等，他们于1850年在《基督教社

会主义短论集》中正式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一词。当时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还处于空想阶段,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关注社会问题的一种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基督教正义精神出发,以基督教传统中对贫穷和不公正的谴责和对上帝之国的期望为基础,关注、批判、谴责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认为劳工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应该获得公正待遇,希望通过基督教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此外,他们还积极倡导建立一种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希望通过“上帝法则”改良社会,回归传统,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所有这些,只能是一种可以理解并且值得同情的美好的空想。^⑤而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很快就超越了“空想”这一阶段。

三、李大钊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 M. C. A”),1844年6月6日由乔治·威廉等在英国伦敦创立,后来逐渐传布到西方各国,1851年流传到美国,1885年自美国传入中国,以中国学生青年会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为标志。基督教青年会是20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属于新教团体,但是又不受传统教会或宗教传统的影响,必须具备基督徒的身份才能加入,后来才向所有青年开放。组织系统分为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其下又分为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主要通过开展德、智、体、群“四育”活动和社会服务诸如倡导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现代体育、科学演讲、文艺演出、医疗卫生、赈济灾民、基督教学生工作,以及推动有关刊物和书籍的出版等,传播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⑥,是一个联系广泛的、世界性的独立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在社会思想或政治思想上,大体属于改良主义一脉。基督教青年会虽然附属于基督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由青年基督徒管理的社团组织,但是并不直接传教,而是间接传教,无形地宣扬耶稣基督的精神,意在感化青年,让其自愿信教。虽然有基督教教会派遣的牧师在青年会内主持开展各项工作,但却是基督教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团组织,可以视为基督教的外围组织、教会的辅助机关,或是基督教的助手。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为了留学生的方便,像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曾经住在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里,无意中接受了没有教堂的教会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提

供的一系列有关服务,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也确实给李大钊等留日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的方便和帮助。李大钊等留日学生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对象,事实上是被动地参加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即使没有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李大钊等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里的留日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也会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某种影响,一般至少是了解基督教青年会的有关情况,有的可能还有一定的好感,甚至是感激之情。

(一)李大钊与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

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于1906年春在日本成立的自治团体,会址在东京神田日本青年会馆内^⑧,1907年在早稻田大学附近下塚町成立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稻田分会^⑨。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英美等国为打破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垄断,抓住1905年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中国留学生这一契机,通过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教务和布道工作由丸山传太郎牧师主持。

1913年底,李大钊在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到达东京后,即由同学安排住在牛込区下塚町520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以下简称会馆)内,会馆坐落在距早稻田大学西南方不远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住在这里,是中国留学日本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的学籍表上登记的现住所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李墨卿在《墨园随笔》中说,他与李大钊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相处甚契,“在早稻田中华青年会同居者年余”,“从这里向北步行五百米左右,即可到早稻田大学”。会馆是一幢三层楼房的建筑,一层是教室、食堂、书亭、小卖部等,二、三层是宿舍。基督教牧师在这里开设有英语补习课和圣经课,食堂还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和娱乐活动提供一定补助,馒头、米饭等主食可以不受限制食用。商店出售新出版的中文书报、生活用品,并有服装缝补等。直到因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二十一条”,缺课太多被开除,李大钊一直都住在会馆内。此后直到回国之前,则租住在月印精舍。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结识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章士钊、陈独秀、林伯渠等人,回国后又通过他们结识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孙中山等一批重要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友人,如安部

矶雄教授、清水安三牧师等。林伯渠曾经多次到青年会馆听各种演讲,到青年会馆开会、阅报、访友、就餐等^⑩。李大钊在会馆内的生活、学习、研究、写作、交游以及参加社会等情况,缺乏系统的记载,他自己偶或提及,如在《哭沈汉卿君》(1917年2月)一文中说:“君于去年考入高等师范文科前,曾与吾同寓早稻田青年会中,或高咏诗歌,或共作球戏,相处甚欢。”^{[9](P504)}下面根据有关资料,予以简要的介绍。

第一,补习英语,为进入早稻田大学做准备。1914年9月才入早稻田大学,此前主要在会馆读书学习,主要是补习英语等。李大钊的日语基础比较好,但是英语还不够理想,他居住的会馆内有青年会开设的英语补习班,李大钊报名参加了补习班。现存李大钊用英文写作的《我的自传》,就是由他当时的英语教师瓦卡阿瑟·鲁宾孙(Arthur Robinson)保存下来的。鲁宾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人,被基督教青年会海外教师派遣委员会派遣到日本担任青年会英语老师,他保存了李大钊的这份作业,使我们能够得知李大钊当时学习的一些情况。而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以后,课前的预习与课后的复习等,也应该是在会馆内进行的。

第二,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全力投入反袁斗争。1915年2月11日,留日中国学生两千余人在神田会馆(又称神田音乐会馆)召开大会,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担任文牒干事,负责起草各种通电、文告等,以唤醒、警示国民,先后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国民之薪胆》等文章,编辑《国耻纪念录》一书,详细记述了日本进兵山东和提出“二十一条”的过程,号召国人痛自奋发,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护国斗争,总会于1916年1月16日在会馆召开大会,重新组织执行机构,成立评议部、执行部,李大钊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其代表作之一《民彝与政治》。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向留日学生总会捐款日金二元,为护国军捐饷日金五元。

第三,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撰写学术论文。如,参与创立神州学会、中国财政经济学会等,认真进行研讨,研究有关问题,撰写文章。比如:1914年8月发表的《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1914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等。《林伯渠日记》中对有关的学会活动有一些记载,其中1916年1月23日记载,易象等发起成立的乙卯学会和李

大钊等发起成立的中华学会于该日合并,改称神州学会,出版《神州学丛》等,李大钊任评议长^{[10](P98)}。神州学会会员共有51人,李大钊和林伯渠同为会员,由此相识。

第四,参加演讲会,听演讲报告。早稻田基督教青年会馆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比较多,目前还无法知道他究竟具体参加了哪些活动。1917年4月19日,李大钊发表《不自由之悲剧》一文,其中提到在神田基督教青年会听美国马秀士博士演讲《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李大钊写道:“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9](P665)}应该说,李大钊对感兴趣活动,只要有时间一般都能够积极参与。

第五,偶尔参与宗教活动。李大钊虽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在星期日偶尔也帮助会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清水安三回忆说,早稻田基督教青年会馆有个星期日学校,有十几个日本人的孩子集合在这里,唱赞美诗,李大钊偶尔拉着手风琴为他们伴奏。“以后的伟大共产主义者,曾在这所周日学校里为赞美歌伴奏,也许是非常有意思的情景。”^[5]

第六,因为李大钊留学日本得到了汤化龙的帮助,受汤化龙之托,他还负责指导、照顾汤化龙之子汤佩松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学习英语。据汤佩松回忆,1914年他年仅11岁,“我小时是李大钊照料,我很佩服李大钊,但是,他很内向,不摇旗呐喊的,做人修养很棒,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什么的。”^{[11](P1)}这也难怪,因为当时连李大钊自己都还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李大钊转变为马列主义者是五年之后即1919年的事情。汤佩松说,李大钊对他要求很严格:“我到东京以后,经常去找李大钊,并于每星期六下午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学英语。每到这一天,李大钊总是站在操场上等着我,远远便可以望到他。我每次去找他,都要检查我的学习,当他发现我学习不认真时,对我批评很严厉。”^{[12](P98)}

毋庸讳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给李大钊等留日学生提供了极大帮助和很多方便,李大钊住在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是他一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而李大钊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和他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是一种巧合。

(二)李大钊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发表演讲

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曾经多次回到天津。其中一次是1917年6月应天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之邀,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此演讲的文稿在演讲前已经在1917年4月18日《甲寅日刊》发表,尽管如此,演讲的内容与发表的文章,也许未必雷同。演讲的稿子已经发表过,为什么还讲?李大钊非常繁忙,而他能够答应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讲,支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自然是适应了李大钊宣传有关思想的需要,也许与他曾经在天津求学,特别是留学日本时期曾经住在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对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关。但是,这应该不是演讲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的理由,只能说明这个题目非常重要,适合形势需要,同时,也有可能是李大钊又有了新的认识需要发表。

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今市少年宫)建立于1914年10月16日,按照当时国际青年会标准模式建造,内设阅览室、会议室、体育馆、礼堂、招待所等,颇具规模。青年会以此为阵地,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声誉,在爱国运动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李大钊的演讲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活动。李大钊在演讲中对日本《中央公论》四月号所发表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提出批评,提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此后,李大钊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于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进一步给予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同时提出“新亚细亚主义”与之相对抗。1919年11月,又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对“新亚细亚主义”作了说明

注 释:

- ① 学术界在李大钊是不是激进(有的也写作“急进”)民主主义者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详情请参阅《张静如文集》第2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546页。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及评价,在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认识上,也有体现。
- ② 在李大钊反对宗教的理由中,把宗教和科学完全对立了起来。现在看来,宗教和科学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能够相互取代,因为科学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够因为反对宗教迷信,反而完全迷信科学。至于蔡元培所说“以美育代宗教”,以及日本文学家川瑞康成所说的“以文艺代宗教”,也许都是为了反对宗教的过度迷信和附带的传统宗教中的封建愚昧。
- ③ 参见清水安三:《李大钊》,载《中国当代新人物》,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按:李大钊生前日本友人就已经发表过介绍并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除本注释所引清水安三的《李大钊》外,更早的还有一篇,即昏迷生(丸山幸一郎的笔名)于1922年9月

和完善。李大钊主张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亚细亚主义”,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是今日“永不称霸”思想的渊源。

李大钊参加青年会或有关宗教组织的活动,应该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挖掘。比如:1921年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严重灾害,中国各界积极地予以援助,并于1921年10月26日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该会由燕京大学著名教授、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全国会长刘廷芳牧师联合张英华、王景春、王葆真等,邀请学商政报教会各界人士及中外慈善家共百余人共同发起成立。由熊希龄担任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任副董事长,耿济之、汪大燮、王正廷、刘镜人、胡适、冯耿光等人任董事,王葆真任干事长,李大钊担任文书股副主任,该会活动很多,李大钊经常轮流值班^①。1922年8月,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为答谢俄国灾荒赈济会对俄国灾荒的救援,曾在北京宴请俄赈会会员、国会议员及在京教育界名流。1924年初,该会宣布解散,曾出版《中俄会议记录》和《救灾恤邻》两本汇刊等。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李大钊和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全国会长刘廷芳牧师是否有过接触,二人关系是否受到1922年李大钊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动的影响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李大钊接触并研究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路径之一。他并未曾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更没有信仰过基督教,只是在他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曾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影响,从而加快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在《极东新信》发表的《李大钊先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后,日文的《北京周报》立即于同年5月8日发表了不见死生的《李大钊的思想及生平》一文,该文评介李大钊更为详细深入。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提法,在学术界一直流行,有的至今还很有影响。在李大钊研究史上,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承蒙日本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信州大学教授後藤延子先生提供有关资料,谨致衷心感谢!後藤延子在给笔者的信中提到,其中个别资料,早在20多年以前,她就给中国的一些学者提供过。

- ④ 按:应该是后来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庶民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1日)等文章的需要。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一文,篇末有一简短但是比较重要的附言,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大钊说:“俄罗斯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

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钜,因之国人对于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亦愈浓”,“拟为有统系之专篇”,此文一直未见发表。然而,这个附言至少说明,长期以来李大钊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并研究俄罗斯革命的发展和进程,他后来率先接受并介绍十月革命绝非偶然。

- ⑤ 学术界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差别,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又称“僧侣社会主义”;有的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它流行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金斯莱和法国的拉梅耐、毕舍等。代表作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短论集》《信徒的话》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认为基督教及其道德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应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原则弘扬普世,使社会主义基督教化;鼓吹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反对私有制和国家权力;谴责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多取少予”等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原则;对当时工厂和工场工人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他们主张以“真正的基督教友爱精神”,依靠国家和上层开明人士的资助,建立生产协作社摆脱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改善工人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恨神圣化的圣水罢了”,“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7、296 页)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反动的社会主义。<http://myy.cass.cn/file/2006012023794.html>。

- ⑥ 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既是一种神学,也是一项运动。”参见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 ⑦ 反感天主教的李大钊当时可能还难以辨别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的关系。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受人资助才能来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只能被动地接受同学和朋友的安排。这是因为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服务不仅确实比较好,而且价格还便宜。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贯的宣传策略,意在感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或者在会馆里“活动”的青年。另外,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期间(1907—1913 年),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他可能对基督教青年会也有一定的了解。
- ⑧ 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 1910 年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立,设本部于北神保町,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大本营,在东京坂上的“清国留学生会馆”遂停止使用。
- ⑨ 同时应该有属于分会的会馆。
- ⑩ 参见湖南省档案馆校注:《林伯渠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55、56、94—96 页。
- ⑪ 李大钊和俄国赈灾会的的关系以及在俄国赈灾会的有关活动,是否受到李大钊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活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牙含章,王友三.中国无神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2]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 李新,刘桂生.《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序[A].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4]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5] 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先生[N].复活之丘,第 130 号,1981—03—01.
- [6] 森正夫.李大钊[J].齐鲁学刊,1987(1).
- [7] 不见死生.李大钊的思想及生平[N].北京周报,1927—05—08.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0] 林伯渠日记[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11] 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
- [12]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史事综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Li Dazhao and Christian culture

ZHU Wen-t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is considered as the earliest Marxist who accepts and spreads socialist ideologies. He launches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 criticizing the Christian fantasy. However, he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ed social streams of thoughts, including the cultures of Christianity during his overseas stay. Li Dazhao does not join in any religion.

Key words: Li Dazhao; socialism; Christian culture; association of the youths

[责任编辑 周祖谦]